

# 吳兆剛：《中國學生周報》 《文藝版創作園地》

「《中國學生周報》以香港為文化宣傳陣地，最初確有『綠背文化』的背景，但《周報》的文藝發展，卻巧妙地利用當時的政治角力，拓展自己的文藝方針，保育着一片純文藝園地。」

吳兆剛，2011，「努力拓墾，孕育新苗：《中國學生周報》文藝版創作園地」，載於梁秉鈞、陳智德、鄭政恒（編），《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》（p.277-281），香港：匯智出版。

\* \* \* \* \*

## 一、寫實作家、編輯與文學創作園地

五〇年代的香港文壇一般被視為沉寂，而且通俗文學充斥整個文壇。不論是南來還是年輕一輩的香港作家，一般都為了在嚴重商業化的香港社會生存，無可避免地與通俗文學扯上關係。<sup>1</sup>《中國學生周報》（以下簡稱《周報》）在1952年7月25日創刊，是友聯出版社的重要工作之一，他們以香港為文化宣傳陣地，最初確有「綠背文化」的背景，但《周報》的文藝發展，卻巧妙地利用當時的政治角力，拓展自己的文藝方針，保育着一片純文藝園地。

五〇年代初，美蘇冷戰和國共對抗影響着香港文學的發展。左右兩派為了向東南亞宣傳各自的政策，在香港及其他華僑地區創辦文學刊物。當時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，港英政府對文藝方面的策略，大體是既不干預也不資助。<sup>2</sup>但左派在四〇年代末以來的文化宣傳活動，已經受港英政府密切注視，在五〇年代初期處處受制。<sup>3</sup>右派在擁有較自由的文化空間下，無論在文化宣傳和報刊的影響，都有一定的優勢，即使後來出現由左派出版的《青年樂園》等，對抗和減弱《周報》的影響力，但是都難與右派建立的文藝空間相提並論。<sup>4</sup>《周報》既有亞洲基金會的資助，也在當時的政治氛圍取得優勢，並且集中以中學生為基層讀者，凡此種種都有利《周報》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文藝報刊之一。

回顧《周報》的文壇前輩，不論是理性分析《周報》個別版面的特色和優點，或是以「神話」、「舊夢」述說那年那天的種種情感，都不約而同地肯定它的發展和重要。本文將以梳理《周報》文藝版創作園地發展為主要討論脈絡，並舉出個別版面和專欄的例子佐證，討論它在香港文學之中的一脈傳承和培育進程。

《周報》在五〇年代的文藝創作園地，多以寫實的題材為主，這與當時的編輯和作家的文藝創作取向有關。由編輯姚拓、黃思騁、方天等，以至著名作家徐速、王敬義、黃崖、力匡等，都重視作品中所表現的真實感受。這種取向在香港文學發展自成一脈，雖無現代主義文學雜誌《文藝新潮》對文壇如浪潮般突如其來的衝擊，但也秉承純文學的認真嚴肅。

《周報》文藝版的主要工作，是為中學生提供創作園地和學習寫作的空間。自第一期開始的「拓墾」主要供初學者投稿，而「新苗」則刊登較成熟的作家或學生作品。於是，編輯或成名作家通過作品和編輯取向，間接影響學生的創作取材和技巧。往後，文藝版陸續因應需求的增加，不斷加入新的創作版面，包括「種籽」、「穗華」、「詩之頁」和「耕耘」等，為當時的中學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創作園地，更日漸發展為影響深遠的香港文學搖籃。

五〇年代後期，學生參與編輯和創作的機會日漸增多，作品開始呈現更多的現代城市感受，而且嘗試更多文學表現手法。六〇年代起，更刊載台灣作家如司馬中原、朱西寧、段彩華、瓊瑤等人的創作，增加翻譯作品的譯介等

等工作，都表現出《周報》對中、西方文化的重新審視，並嘗試轉化為本土題材，思考身份的開端。黃繼持認為《周報》與其他刊物在六〇年代初的文學轉變，可見香港文學已在思潮和創作等方面醞釀着重大的轉變，也不無道理。<sup>5</sup> 以下將舉出幾個重要的例子，展現《周報》五〇年代的文藝創作版面的風格和發展。

## 二、學生創作的先導者：「新苗」版的成熟作品

「新苗」刊登的是成熟作品，例如徐速撰寫的短篇小說〈校花〉，<sup>6</sup> 及後的不少年青作家如王敬義、黃思騁、黃崖等人的作品，都運用豐富的創作技巧，書寫不同種類的題材。這些作品無疑是當時中學生的文學創作先導者。

「新苗」版的寫實文藝正是由編者帶領，編者在三週年的回顧文章〈「新苗」的期望〉說：「在以往的文章裏，有積極性的、建設性的文章仍嫌太少。以後，我們希望能繼續向這一方面努力，開闢出一個新文藝的道路。」<sup>7</sup>

王敬義和黃思騁的作品，代表「新苗」最早發展的方向。黃思騁忠於寫實主義的態度，對文藝抱有一種使命感。黃思騁在《周報》發表對文藝的討論：「大致上，一個作家寫文章有兩個目的，第一、他想到一些東西，想把它表達出來。第二、通過它的作品，他傳播一些真理。」<sup>8</sup> 黃思騁提出文學的功用，認為文學可以作為「傳播一些真理」的方法；王敬義較為年輕，在他的〈貧窮〉一文，從構思一個長篇小說過程談起，直接討論文學作品的題材：「我們更需要一些進取的、戰鬥性的作品，是對未來的讚歌，而不是對舊時代的輓歌。」<sup>9</sup> 他認為作品要有積極意義。

黃思騁本身是《周報》創刊的編輯成員之一，<sup>10</sup> 六〇年代轉到星馬編輯《蕉風》。<sup>11</sup> 他的早期作品較直接抒發這種「真理」，經常在結尾加上總結，略帶說教的成分。例如〈賣報童〉<sup>12</sup> 以個人第一人稱敘事出發，透過觀察敘述賣報童種種艱辛的生活，並親身幫助賣報童免受同業成人的欺負，總結人間有溫情。

王敬義早年在培正中學求學，後轉到台灣師範大學外文系讀書，求學期間曾經在港、台發表不少作品，<sup>13</sup> 《周報》是其中之一。他的作品最早發表於1953年《周報》第六十期，直至1960年為止，發表超過四十篇作品。後來在1966年至1967年間重新投稿，但以書評和討論文學為主。五〇年代的王敬義作品，不宣揚作品的「真理」，反而重視作品的意義。

王敬義較早嘗試新的表現技巧，例如〈病中〉<sup>14</sup> 描述病中的心理，以碎裂的意象、詩化語言和沒有規則的結構，展示病中的混亂思想；〈淪落人〉透過拾得一本筆記，從閱讀中了解一個瘋狂青年所見之物，以象徵及陌生化手法開首：「日子像是拙笨畫匠的筆塗繪出來的，沒有結構的畫面，線條無力而散亂，過分誇張的明艷的彩色，相反地使人看到混濁的灰色。」；<sup>15</sup> 〈耽誤〉<sup>16</sup> 先書寫一個風塵女子梨本菊子和十歲的兒子吉坊，為了生活服侍森信三。有一天菊子收到去了支那（中國）作戰的丈夫大野次郎寄回來的匯票，卻是當年因為吉坊嬰孩時生病急需的金錢。同時已殘廢的大野次郎曾經到訪，卻原來已身患急病，臨死回憶過往在中國曾在殺人前，看見女人手上的嬰兒而想起自己的兒子。兒子吉坊於是成為菊子生存下去的勇氣。上述的例子，在表達技巧和心理描寫方面都非常成功，無疑成為了年青作家和讀者的文學啟導。

- 
- <sup>1</sup> 有關五〇年代香港文壇的討論頗多，劉以鬯《暢談香港文學》以個人經驗出發，也提及自己曾經寫通俗小說。另外，在《周報》討論當時的文壇風氣，也有相同的論調。同時可以參考劉以鬯為《香港短篇小說選（五十年代）》（香港：天地圖書，2002年）所寫的序。
- <sup>2</sup> 〈香港文化藝術政策回顧（1950-1997）〉，參考自香港藝術發展局網頁：<http://www.hkadc.org.hk/tc/content/web.do?id=ff80818123dbba560123dbfc189c001a>。
- <sup>3</sup> 張詠梅：《邊緣與中心——論香港左翼小說中的「香港」（1950-1967）》（香港：天地圖書，2003年），頁52-66。
- <sup>4</sup> 《青年樂園》由左派文化工作者創刊於1956年4月，當時以《周報》作為模仿的對象，用意減少《周報》的影響力。其他刊物如《小朋友》，也是對抗友聯的《兒童樂園》而來。友聯出版社對此作賤視態度，在《周報》也經常在「學壇」和「大孩子信箱」專欄提醒學生讀者，以免魚目混珠。
- <sup>5</sup> 黃繼持、盧瑋鑾、鄭樹森：《追跡香港文學》（香港：牛津大學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91-102。
- <sup>6</sup> 徐速：〈校花〉上、下，《周報》第3及4期，1952年8月1日及8日，第四版，新苗。
- <sup>7</sup> 編者：〈「新苗」的期望〉，《周報》第157期，1955年7月22日，第四版，拓墾。
- <sup>8</sup> 黃思騁：〈文藝的普遍性和永久性〉，第五十九期，第三版，讀書研究。
- <sup>9</sup> 王敬義：〈貧窮〉，《周報》第107期，1954年8月6日，第二版，生活與思想。
- <sup>10</sup> 黃思騁：〈我的祝頌〉，《周報》第157期，1955年7月22日，第三版，三週年紀念特刊。
- <sup>11</sup> 劉以鬯主編：《香港文學作家傳略》（香港：市政局公共圖書館，1996年），頁111-112。
- <sup>12</sup> 黃思騁：〈賣報童〉，《周報》第91期，1954年4月16日，第五版，新苗。
- <sup>13</sup> 劉以鬯主編：《香港文學作家傳略》，頁197-198。
- <sup>14</sup> 王敬義：〈病中〉，《周報》第99期，1954年6月11日，第五版，新苗。
- <sup>15</sup> 王敬義：〈淪落人〉，《周報》第125期，1954年12月10日，第七版，新苗。
- <sup>16</sup> 王敬義：〈耽誤〉，《周報》第153期，1955年6月24日，第九版，新苗。